

中东经济民族主义评析

冯璐璐

摘要: 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带有外生型和防御型特点,是在西方强权和文明的入侵下产生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遗留下的不平等因素和国际经济收益的不平衡也是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在中东扩散的原因之一。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在对抗强权干预和经济控制方面有意义,但在维护自身权益、发展经济以及争夺地区霸主的同时也体现出无视邻邦兄弟国家和地区整体利益的狭隘性和自我封闭性。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族主义形成了巨大冲击,但二者之间又有极大的同步性。

关键词: 中东; 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 缘起与表现

Abstract: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Middle East characterized by foreign and defencing aspects, which came into being under invasion of the West and 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Middle East is meaningful for resisting the intervening of power; meanwhile, it also shows parochialism and obturating when they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 So, countries in Middle East should depend on outside as well as cooperation of inside under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Middle East; Economic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Origin and Content

经济民族主义兴起于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随后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拉美和东亚由于具有基本相同的地域文化和族群,其经济民族主义声势浩大,引人注目。中东民族主义思潮相对较为复杂,加之各国自然资源和条件有差异,内部存在各种民族问题,还有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干扰,这使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体制和发展理念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统一性,但中东又拥有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和壮大的条件,如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是阿拉伯民族。近年来,中东地区问题叠出,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民族主义也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此作一分析。

一、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缘起

当民族主义以一种政治思潮的姿态吸引人们从和平角度去关注现代化时,时代的另一大主题——发展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民族主义不仅从政治策略上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与模式,而且还直接以一种社会思潮的方式进入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形成“各民族、各国家乃至各区域经济集团之间冲突日趋激烈的经济民族主义”^[1]。

学术界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资源独立和经济独立等角度对经济民族主义做出了解释。一是主要针对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政治应当是重于经济的第一要素;二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单纯理解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三是虽然探讨的是拉美和东亚等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状况,“但却恰恰反映了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的两股主流”。^[2]中东与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极为相似。人们虽然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即强调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国家要保护民族经济,适当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它可追溯到18~19世纪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倡导的争取民族工业独立和发展的保护关税理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运动。由于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又被称为发展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在针对发展主义思潮的反思过程中涌现出一种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系的依附理论,以德国的安德烈·弗兰克、巴西的多斯·桑托斯、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发展主义倡导的发展模式会导致“越发展越依附”

的后果,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同中心国家完全“脱钩”,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这种发展主义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将发展理论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3]。

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势头在发展中国家的上升,在中东也不断得到强化。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带有外生型和防御型的特点。大多数中东国家是在强权的刺激之下才导致政治变迁和经济变迁的,是因为西方文明的侵入与强烈刺激,为了反对西方才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的,因而被一些外国学者称为“引进型”发展和“防御型”现代化,以同欧洲国家由内部滋生现代化因素的类型相区别。中东各国最初主要受东西方发展模式和各类思潮的影响,效仿别国的发展经验,不同程度地照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最终导致70年代以来经济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出现失业率增高、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80年代中期后,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意味着一些伊斯兰国家已深刻认识到必须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于是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强化宗教与民族属性的呼声中显现了出来。

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国际地位及相互的关系也是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在中东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的原因。众所周知,当前以全球化和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仍然存在着不合理因素,由于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综合国力的较量、科学技术力量和民族权益争夺的过程中,处于“外围”的中东各国与欧洲等发达的“中心”国家相比,无论在生产力、科技、信息、资源分布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这种态势决定了国际经济收益越来越不平衡,中东各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只能处于越来越“依附”和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地位,其经济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中东各国或各民族惟有以经济民族主义来防范别国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既代表着经济之争,也反映出政治上的较量。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经济、政治危机,借“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名,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向中东各国提

供经济援助时的附加条件也越来越苛刻。这样便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在中东经济发展进程中,南南合作的态势逐渐减弱,南北合作的态势则趋明显,它们积极参加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寻求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二是中东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矛盾加深。

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际经贸关系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与剥削现象的存在,经济强国对弱小国家经济的操纵都构成了刺激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经济动因”^[4]。“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政治演进不同步,则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掀起的深层原因。”^[5]从此意义上讲,中东地区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对外依附,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

二、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

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回本国经济活动控制权,推行国有化运动。二战后初期,中东各石油生产国发起了石油国有化运动。在经历了争取利润对半分成的分散斗争,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领导下提高油价和部分收回石油资源主权,以石油为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全面掌握在石油主权国三个发展阶段之后,70年代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了全部石油生产权,石油国有化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中东人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敢于掌握资源主权,向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挑战;同时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融为一体,促进了第三世界的觉醒。^[6]此外,非石油生产国的埃及在1956年宣布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随后大规模接收外国公司,到60年代初国有化运动获得很大进展。

第二,伊斯兰化运动。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东的特殊地位,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往往和宗教民族主义交织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推进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手段。随着资源的国有化,中东个别国家打起伊斯兰复兴旗号在金融领域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伊斯兰化运动,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曾一度攻击阿拉伯的伊斯兰银行运动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伊政府决定全面贯彻伊斯兰原则,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实施国有化政策,在1979年宪法中明文规定金融企业属于国有,导致银行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均控制在毛拉手中,其许多资产都流向由神职人员控制的伊斯兰慈善基金会。

第三,积极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中东地区在生产领域的合作始于70年代,为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地区贸易合作,除阿盟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生产领域的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它组建的一系列组织在促进石油工业、完善石油生产下游服务、协调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影响。70年代,中东地区的农业合作也有所发展,1976年建立的苏丹农业发展基金,为的是满足其他阿拉伯国家近一半的粮食需求。同年,阿盟13个成员国签订了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协议,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农业,以解决中东粮食短缺的难题。

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是在一系列一体化组织和地区经济集团的协调和推动下完成的。阿盟在这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早在50年代,阿盟就成立了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帮助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国之间的资源互动和分工合作,同时还成立了阿拉伯金融组织,签署了《阿拉伯经济一体化协议》。60年代,阿盟提议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年签订了《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逐步开展自由贸易。1971年,在阿拉伯金融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地区性多国货币金融组织——“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会”。80年代,随着各国经济的转型与变革,中东经济一体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集团化发展特征日益突出,成立了两个地区经济集团的雏形——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90年代是自由贸易区在中东崛起的高峰时期,在塞得港、亚历山大、阿里山、贝鲁特和本扎尔特等地共建成5个自由贸易区,另有亚丁湾自由贸易区、苏伊士自由贸易区等8个自由贸易区正在筹建中。^[7]这些成就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奠定了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各成员国和区域之间的资金、贸易、劳务和技术的互动。

第四,日趋激烈的资源之争。资源问题被视为中东各国各民族权益之争和武装冲突的诱发因

素。1990年伊拉克出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海湾采取“沙漠风暴”行动以及近年来爆发的阿富汗战争和“倒萨”战争都与石油资源争夺有关。此外,还有水资源的争夺,如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1965年的六五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都与水资源有密切关系。水资源还影响到埃及与苏丹及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的和睦相处,成为一些国家解决政治争端所持的要挟武器。水资源问题在中东各种冲突与纠纷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许多学者推测,它将成为该地区未来冲突的主要根源。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主权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有表现,但对包括中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产生的影响更加持久与激进。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是本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犯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8]。中东经济民族主义更蕴含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权益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在对抗强权干预和经济控制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维护自身权益、发展经济和争夺地区盟主的同时也表现出无视邻国和地区整体利益的狭隘性和自我封闭性。因此,当中东经济民族主义试图联合起来抵抗西方霸权、向国际经济旧秩序挑战时,又会因自身的狭隘性而滋生出内部分裂因素,如梯比所言,“反殖民民族主义拥有排他性的民族观点”,它们往往“拒绝欧洲的理性主义和工业化”^[9]。这些,都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现代化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东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族主义形成巨大冲击,有学者说:“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模式的一种理想憧憬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则反映了民族国家对现实世界所持的谨慎、克制的态度”^[10]。正因为二者表达的是不同的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强化,中东各民族的认同意识不同程度地淡化,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的出现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及民族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构成严峻挑

战。萨米尔·阿明指出：“生产过程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因为拥有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营销网络而成为绝对的中心，其他边缘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全球化虽然没有使正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趋于消亡，但却严重影响到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11]

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悲观看法表示，自二战结束以来，民族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组建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在国际分工的发展下，经济的基本单位已由大大小小的跨国企业所取代，它们用来相互沟通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交换网络都不在任何政府的控制范围内。霍氏认为：“这种新世界体系是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类大型的‘民族国家’联盟所组成，且完全由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体系进行操纵。其实这类国际体系的出现，就足以显示出‘国民经济’的消退。”这种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全世界的移民潮，不论是跨国或跨洲移民，其声势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所仅见。“移民狂潮意外激化了社群之间的磨擦和冲突，也增强了各国人民的种族歧视心理。”^[12]

对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许多学者持乐观的态度。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或大一统的“世界政府”仅是人们所设想的终极目标而已。因此，即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丧失其经济功能，国家仍然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对中东各国而言，国家在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制定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引导有竞争力企业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自80年代起，各国纷纷鼓励私营或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发展。国家除承担传统功能外，还是社会收入的分配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更加突出的角色。

在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东西方存在争议。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全球主义”政策和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特别主张人道主义干预；而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国家民族主义”政策，要求拥有独立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等矛盾的权力，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主

权和利益，强化自己的传统文化。^[13]这种精神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当然，全球化时代赋予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严峻的，要求民族主义必须发挥兼容精神和创新功能，以自身蕴含的现代性树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并且可以成功地实现民族经济的结构转换。

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合拍的地方，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化解经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发展有“节制”的经济民族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赖克曾提出发展“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认为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发达国家有必要向它们输出标准化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减轻其债务负担和提供新的贷款。^[14]该主张重在强调国际力量的重要性，对推动全球经济互动与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如果仅靠国际力量，很难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同步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需要建立一个开放并具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以使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形成广泛的交流和兼容。为了适应国际竞争，中东各国须在确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实施民族经济结构调整和实施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即在政府的领导下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国内经济资源，强化国内外经济联系，独立自主地参与国外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当前中东已经努力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尤其是采取世俗化道路的国家更是如此，如1995年欧盟—地中海首脑会议提出在2000年建立“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996年6月以来，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十项协议中有针对突尼斯、摩洛哥、以色列、土耳其的四项协议已经签订，土耳其与欧盟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土耳其、摩洛哥等一些国家还积极申请加入欧盟；^[15]此外，海合会等地区组织还以地区经济集团形式寻求与欧盟的合作，希望建立更大的自由贸易区。

中东各国的民族经济能否成功地转换，最终

取决于三个变量,即特殊化的贸易结构,政府的宏观调控即政治干预和来自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势力的支持。由于后两个变量难以预料,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民族经济前景尚是未知数。但目前以色列已拥有较为发达的多样化工业结构,正在向再现代化阶段过渡,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均已走完了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可以肯定,虽然全球化经济是由金融、技术、信息和文化的灵活性等一些非物质因素所控制,对中东各国民族经济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这种现实决定了在经济民族主义引导下的中东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地区间的相互依存,也需依靠外部力量,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前的经济转换并不能使中东更发达和更和平,除非在国际和地区内部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16]

注 释:

- [1][3][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297、55页。
[2]文勇、王静:“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秩序”,载《淮南

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 [4]刘仲民:“关于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
[6]黄民兴:“战后石油天然气出口在世界原料市场上的地位”,载《世界石油经济》,1989年第3期。
[7]刘晖,张晏辉:“世界新秩序中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崛起”,载《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2期。
[8][11]陈安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29页。
[9]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7, pp64~69.
[10]邹树彬:“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载《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13]王勇:“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14]张志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和表现”,载《理论探索》,2003年第4期。
[15]杨光:“中东、非洲地区经济难见起色”,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月。
[16]Laura Guazzone: *The Middle East in Global Change: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Versus Fragmen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1997, p247.

上海中东问题青年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4年12月1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的青年研究人员相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年轻人的角度对目前普遍关心的中东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杨洁勉副所长和李伟建主任先后致辞,他们指出在上海研究中东问题的老一辈已经保持了多年的经常性联系,但是年轻人之间的了解与联系还较薄弱,这种带有专业性质的青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推动双方研究水平上一个新台阶的有益尝试。讨论和交流是很好的学习方式,能够检验一个人的研究和思考水平,特别是年轻人思维活跃,反应快速,更容易通过交流激发出思想碰撞的火花,对于各方应该都能达到共赢的效果。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议题:后阿拉法特时代

的巴以局势,伊拉克问题以及中东能源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的青年研究人员就不同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整理如下: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以局势

对于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以局势走向,会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大选尘埃落定,阿拉法特去世,一个多月以来,巴以局势总体上尚属乐观,与今年5月相比,双方都比较克制,并没有出现失控和混乱局面。从1978年埃及总统访问以色列,到奥斯陆协议的签署,每次阿拉伯世界陷于困境时,中东的和平进程都能获得发展,就是说,在中东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之时能够达

成某种协议(而非在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时期达成协议)。1978年埃及处于空前孤立状态,而在1993年前后,阿拉法特亦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恰恰是在这种被逼上绝路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寻求一种突破口,推动和平协议的达成。目前这种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巴勒斯坦很可能会走出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阿巴斯当选的几率较大,但不排除巴尔古提今后在巴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舆论对阿巴斯的评价是务实、灵活。不仅在他能不能让步方面,而且他很可能在相对空泛的框架内订立协议,而把实质性的内容暂时搁置。总的来说,恢复和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很难按照路线图计划进行和谈和建国,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一个观点认为,中东和平进程面临的更多是困难。首先阿拉伯国家对支持巴勒斯坦已经有心无力,加上阿拉伯国家自身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更削弱了和谈的砝码。另外叙利亚等强硬国家的态度给中东和平进程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阿拉法特去世之后,美国发出了一些明显的信号,而叙利亚等国家也把巴以局势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使得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其次,阿拉伯世界并不十分关心巴以双边框架的确立,阿拉法特的去世既是借口的消失,也是机遇的消失,阿拉伯国家要正确使用这把双刃剑。第三,巴尔古提释放的可能性很小,巴勒斯坦内部亦需要时间磨合。而中东和平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首先解决伊拉克问题,现在伊拉克的重建困难重重,这无疑给中东和平进程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同时,也有学者提到,现在争论的不是巴勒斯坦应不应该建国的问題。美国、以色列等都不反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以色列控制军事经济的巴勒斯坦国,还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己主宰的民主国家。

伊拉克问题

伊拉克大选能否获得成功,就目前的形势进行分析,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安全上,美国增加在伊的驻军,也有国家宣布延长自卫队在伊

的驻留时间,同时伊临时政府已经运作了半年时间,经过半年的训练与磨合,人民对伊临时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任,相信其能够控制局势。财力上,美日欧等纷纷宣布减免伊的债务,中国也承诺对伊援资2500万。这些都保证了伊大选能够顺利进行。国际政治局势方面,伊朗、叙利亚等强硬国家很难给伊拉克施加消极影响。而阿富汗、乌克兰等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则给伊拉克以积极的示范作用。从不利方面来说,外部势力的渗透,美军存在对伊大选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国家的不够积极的态度等都是阻碍伊拉克大选获得成功的因素。

能源问题

伴随世界油气重心的时空变化,新的油气地缘经济格局将是“大石油中东地区”(指由中东、北非以及环里海地区组成的巨大的油气供应区)连同俄罗斯的油气将在全球油气供应、出口和定价方面相互影响,联成一个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到海湾、里海、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巨型带状区域,这里蕴藏着世界65%的石油储量和73%的天然气的储量。有关国家围绕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和跨国通道构成内外两个三角之间的战略竞争的关系。内三角主要指中国、伊朗和土耳其三个地区在亚洲腹地油气运输通道上的竞争;外三角主要指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三大实力之间的相互钳制的关系,内三角的三个地区实力要受到外三角的三个大国实力的极大的影响。通过对世界油气形势的总体分析,中国内部制定了2020年多元化、有保障、节约型的油气战略。

能源安全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凸现,使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得到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中东的政策主要是政治驱动,80年代到90年代是经济驱动,到了90年代以后则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驱动。当前要做的是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中国的中东政策是中国对外政策对外形象的重要部分,中国现阶段是一种有限介入,更多的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多边力量来实现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叶青